

第八章 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現況與問題

第一節 發展與現況

在先前章節中已明白指出，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急速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改革深化之後，經濟活動力大幅提昇，這方面最有力的佐證便是其對外經貿金額的快速擴增。在此種階段舊有的職業結構也隨之轉變，其共同的特徵是勞動者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層次有往上提昇的現象。在此種情境下高等技職教育所扮演的功能也愈形加重，生產過程與經濟活動所需的大部分人才往往需由高等教育機構得到滿足。在劉水深（民 85）對中國大陸管理教育的研究結論之一便明白顯示出，經濟活動與高等教育機構兩者間緊密的互動性：

「近年來，對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隨著改革的深化，企業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訓練的管理人員。由於對於管理人員大量而緊迫的需求，促使大陸日益重視管理人才的培養，各種形式的管理教育空前發展。據統計，經濟管理類專業點從 1978 年到 1986 年，七年內淨增六倍多。」（頁 12）

另外，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宋懷德（1991）認為有五種主要因素促成高等技職教育的蓬勃發展： 1. 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為現代生產力進步的產物、 2. 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要使中國大陸朝向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來建設，並提出總任務與具體的奮鬥目標，現代化便直接與具有市場性的技職教育相關聯，這

種大層面架構的轉變直接提供職業大學發展的更大空間與思想基礎。3.中國職業大學的興起，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指的是人力素質的提昇與社會進步有直接相關聯的關係，而中國大陸以往處於較落後的局面，所以要促使社會進化必須提供較好的勞動力，職業大學正可提供這方面的服務，並且職業大學有因地制宜的特性，它可解決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所產生極大不同需求的問題。4.隨著改革、開放、搞活政策的深入貫徹和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戰，以內部和外部加速了我國職業大學的產生和發展：職業大學的出現與發展依賴的是，城鄉經濟體制改革所產生的巨大動力，以及群眾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的產生來自於開放、改革政策的影響。5.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現代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有其重要的特殊功能：高等技職教育能滿足社會進步與經濟活動的需求，它能培育相關的高級專業人才，這些高素養的勞動力能將高級的知識與技能，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最大的功效，並提昇生產效能。

職業大學數量的成長情形亦與上述的論點一致，職業大學的開創始於 1980 年，第一批設置的學校數僅有十三所，當時創設的背景原因在於，為求配合地方發展建設所需的不同類別人力，並要滿足社會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然而，設立初期在數量上並未有明顯的成長，其主要原因在於當時設立之初尚未有法源基礎。這種情形直到第五屆全國人大的第五次會議才取得合法地位，這種情形的改變直接影響到職業大學的擴張速度。

從下表七中的資料可明顯的發現職業大學的數量從 1983 年起有明顯的成長，並且在 1983 年到 1985 年間，職業大學數量快速成長，年成長率高達 50%左右(1984 年為 54.72%，1985 年為 43.90%)。伴隨職業大學的快速擴張，無論在校學生數或是專任教師人數亦有可觀

的增加，例如單就 1985 年而言在校學生數比前一年增加超過三分之一(34.48%)，專任教師人數增加的比率更高達將近三分之二的水準(65.05%)。

表七 歷年職業大學學校、學生與教師數量統計表

年份	學校數	在校學生數	專任教師人數
1983	53	227,331	2,321
1984	82	46,956	3,725
1985	118	63,145	6,148
1986	128	73,942	8,154
1987	122	77,531	9,167
1988	119	75,342	9,291
1989	116	74,952	9,938
1990	114	72,449	10,077
1991	114	63,459	9,823
1992	85	66,219	9,446
1993	83	79,909	9,614
1994	87	93,939	10,714

資料來源：黃政傑等(民 85 : 8)

這種擴張的趨勢到 1992 年急速逆轉而下，從前一年的一百一十四所銳減為八十五所，減少比率高達四分之一(25.4%)。據研究指出這種轉變乃在於職業大學的發展政策缺乏長遠且縝密的規劃，再加上教育經費不足(黃政傑等，民 85)，最後導致中央政府採取緊縮的政策，以致於職業大學在數量上銳減。儘管學校數量減少，但是若從在校學生數或是專任教師人數來看，這種改變似乎僅是一些職業大學的合併或是裁撤，對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影響仍是有限。例如，前述在 1992 年時職業大學的數量銳減約兩成半，但是該年的在校學生數僅比前一年只減少一成多(12.41%)，專任教師數減少的比率更少僅達 3.84%。間隔兩年之後，高等技職教育似乎又受到重視，雖然其學校數量僅有微幅的成長(4.82%)，但是在校學生數卻從 1993 年將近八萬名，躍升到隔年幾至九萬四千名的水準，成長率將近兩成(17.56%)。

上述要點說明了，儘管職業大學在 1983 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並且大體上維持擴張的趨勢。但是數量的增加並無法說明其實際成效，這方面仍需考慮到學校規模、師資、經費、設備與圖書等條件的配合。以下段落便針對這些項目加以分析討論：

第二節 學校規模概況

儘管在數量上有可觀的成長，然而許多以往的研究資料呈現出，在規模上絕大多數中國大陸高等技職學校仍處於迷你型的階段。在 1986 年時研究者林琨寶對其一百二十八所樣本學校所作的調查分析便呈現此種狀況，從表八中的資料可看出擁有超過一百畝的學校數只有二十七所，在總樣本數中佔約兩成(21.09%)，介於一百畝至五十畝間的學校數不及兩成(17.19%)，不足五十畝的學校數高達六成以上(61.72%)。

表八 1986 年職業大學校園面積統計資料

規模	數量
100 畝以上	27
50-100 畝	22
50 畝以下	79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69）

歷經五年之後，此種情形並未有明顯的改善，宋懷德(1991)的研究結果指向「小型」職業大學仍居於主流。在其一百二十四所樣本職業大學中，校園面積達一百畝以上的有二十七所，在總數中所佔的比率微幅超過兩成(21.77%)，介於五十至一百畝間的有二十二所，其比率亦接近二成(17.74%)，其餘的面積在五十畝以下的有七十五所，所

佔比率為六成(60.48%)。從上述兩項研究發現中可歸納出，在中國大陸擁有較大校園面積的職業大學仍是少數。

以往的研究中發現這種「小」的特徵，不僅出現在校園面積上，學生數與專任教師數也呈現少的情況，從下列表九與表十中的資料便可發覺到這種特徵。在學生數方面，一千人以上的學校數在總樣本數中僅微幅超過一成(12.30%)。相反的，五百人以下的學校卻有將近一半的數量(49.18%)。專任教師的人數似乎亦有類似的狀況，擁有兩百名以上專任教師的學校，在總樣本數中僅及約一成(11.72%)，一百名以下的小型學校仍是絕大多數，高達計五成(46.88%)。

表九 1986 年職業大學在校學生數統計資料

規模	數量
1,000 人以上	15
500-1000 人	47
500 人以下	60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69）

表十 1986 年職業大學專任教師人數統計資料

規模	數量
200 人以上	15
100-200 人	53
100 以下	60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69）

這種職業大學「小」的特性仍須與其他高等學校作相互比較才具有實際上的意義，因為前述許多研究者所使用的數目多寡的分類並未有絕對的標準。如林琨寶的學生數分類以一百人以下來表示少數，或許亦可以兩百人以下或是五十人以下為參考點。基於此種可能產生的爭議性，職業大學的規模應與其他類別的高等院校相互做比較才有意

義。下表十一中的資料列舉高等教育階段各類學校的規模狀況資料，在總體上可發現雖然綜合大學在數量上並未享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在其他項目的優勢條件卻遠超過所有類別的學校。從學校數量而言，職業大學扮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排名第三僅次於理工院校與師範院校，是林業院校的十一倍(1109.01%)，這種學校數量便顯示出職業大學在高等教育市場的重要性。

儘管職業大學數量眾多，但是學校規模卻似乎處於迷你型的階段，這方面可從其平均每校學生數一欄中的資料看出，在排列上職業大學的 636 人為倒數第二，僅超越藝術院校的 380 人，與全國水準相比僅及三分之一左右的規模(34.51%)，與規模最大的綜合大學相比較，相差程度更遠，差距有七倍半之多(754.87%)。

或許學生數不多可能是職業大學採取小而美的路線，然而相關資料卻無法證實這一點，相反的卻呈現小而簡陋的局面，這方面可從其平均每校教職工數、平均每校專任教師數、平均每校科研機構人員數等三項中的數據歸納出。在教職工數一項，除了職業大學之外，其餘各類學校最少（藝術院校，398 人）仍擁有近四百人的水準，是職業大學 154 人的兩倍半之多（258.44%），擁有最高人數的綜合大學（2340 人）比職業大學超出十五倍以上的程度（1519.48%）。

在平均教師數與平均科研數兩欄，職業大學皆敬陪末座，就專任教師一欄而言，職業大學的 75 人仍不及最高水準綜合大學（936 人）的一成（8.01%），相對於全國水準也只達兩成左右(20.66%)。科研機構人員的情形更為嚴重，職業大學的 0.7 人超低水平尚不及綜合大學（164 人）的百分之一（0.43%），與全國平均數相比較只有 2% 的低落程度，即使與倒數第二的體育院校（3 人）相比，尚未達四分之一（23.33%）。

表十一 1987 年高等學校分科規模比較

學校	學校數	平均每校學生數	平均每校教職工數	平均每校專任教師數	平均每校科研機構人員數
綜合大學	47	4801	2340	936	164
理工院校	275	2512	1432	528	69
農業院校	60	1862	1155	420	22
林業院校	11	1579	988	400	21
醫藥院校	119	1493	884	346	35
師範院校	260	1816	632	289	11
語文院校	14	1018	807	331	20
財經院校	74	1343	575	253	8
政法院校	25	1100	506	198	7
體育院校	16	803	471	204	3
藝術院校	30	380	398	182	8
民族院校	10	2027	1040	421	4
職業大學	122	636	154	75	0.7
總計	1063	1843	911	363	35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68）

由以上各項資料可清楚的歸納出職業大學不但只是處於小型的規模，而且相關教學與研究人員的配置遠低於其他類型的高等學校，這顯示出職業大學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存有一些嚴重的問題。這種推論可進一步從表十二中的資料得到證實，在教職工與學生比一欄中，職業大學平均約 4 人才分得一位教職工。相反的，在大學、學院、專科學校等大專院校，平均不及兩人便擁有一位教職工，兩者間的差距超過兩倍（213.40%）。若再進一步探究與教學最直接相關的專任教師與學生比，情況亦相當不樂觀，職業大學與大專院校相比亦有近兩倍的落差（172.65%）。高等學校除教學外，學術研究亦扮演著對等的重要角色。然而，職業大學所擁有的相關人員數亦令人憂慮，其科研機構人員在教職工人數中尚不及百分之一（0.49%），此一低落水平僅達大專院校一成左右的程度（12.44%）。

表十二 1987 年職業大學與其他高等學校人員結構比較

學校類別	職業大學	大學、學院、專科學校
學校數	122	941
教職工與學生比	1:4.14	1:1.94
專任教師與學生比	1:8.46	1:4.90
科研機構人員佔教職工比率	0.49%	3.94%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74）

這些以前的研究資料顯示出職業大學普遍有小型化的現象，無論是在校園面積、在校學生數、學校職工數、專任教師數、科研人數、或是後三者與學生的比率等方面，皆比其他高等學校遜色不少，也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許多。雖然，學校規模小並不能決定其教學成效，但是卻存有教育資源投資效益的問題。

由於歷經一段時日，某些方面可能有所改變，本研究小組在實際訪視中便發現，中國大陸的高等技職教育在在學校規模上有逐漸大型化的現象。如受訪對象福建中華職業大學的學生數由創校時的 108 位，激增至現今一千八百名左右的水準。另外，學生數在一千人左右的學校尚有，上海東滬高等職技學校與閩江大學。較大規模的學校包刮，廣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約有三千名的學生，廣州市職工大學不含中專部學生，同樣擁有三千人左右的學生。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的學生數略高，約為三千七百名。吉林工學院的學生數更多，約為五千人。北京聯合大學的規模堪稱超大型，其學生數約為一萬一千名。

推測產生這種大型化的原因可能有二項，其中之一是受惠於先前在第七章已討論過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展。其二是時間的因素，前面所引述的研究資料距今已有一段時日，有些甚至超過十年，在當時高等技職教育尚處於萌芽的階段，自然學生數較少。然而經過時間的延長，再加上前述政策的激勵，學生數便產生大型化的現象。但是這種

推論尚待進一步作全面的調查，因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受限於經費、時間、人力等因素，再加上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如中國大陸幅員遼闊，行程安排不易、某些學校無意願受訪等，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斷論受訪的學校足夠具有樣本的代表性。

即使出現學生數大型化的現象似乎仍隱藏著另一項問題，在先前已論述到學校的校園面積普遍不大，若學生數逐漸增多，便意味到學生的活動空間逐漸縮減，這代表著教學環境有待改善。

第三節 師資條件

延續前述段落中所指出的，職業大學在師資方面似乎並未擁有足夠的員額，這種現象便直接影響到其教學品質。或許由於以往在校學生數量不多，自然不需太多的專任教師，而可宣稱小而美的特性。然而，就如先前已分析過的，職業大學的平均師生比仍遠低於一般全國的水平。除了數量不足外，一些研究指出高等職業技職教育的師資仍存有一些更嚴重的問題，其中包含師資結構、學歷等問題。

首先是師資結構的問題，前述專任教師員額低落的情形便暗指，兼職教師似乎扮演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實際上，相對於專任，兼任教師的數量不在少數，如在 1991 年時某些學校專、兼任教師的比率達到四分之一水準，有些學校的比重甚至高達三分之一的程度。形成這種兼職教師比重偏高的原因在於，中國大陸技職大學的師資結構採用專、兼、聘任的制度（黃政傑等，民 85）。另有研究者汪宗正（1991）指出，高等技職教育的師資要求異於一般高等院校，後者的師資以專任為主，強調理論基礎和學術水平；而前者則是專兼結合，在這種組合之中，基礎課教師以專職為主，專業課教師則以兼職為主，兼職為主的原因在於專業教師需求較強的實踐經驗，以致於

兼任教師在高等技職教育師資群中一直佔有相當高的比率，當然這也顯示出其教師結構的問題。

至於兼職教師人數為何居高不下？俞克新等（1991）的研究發現似乎可提供部分的解釋，其論點依據來自於對三十所職業大學所作的調查分析，他們的結論是職業大學師資問題產生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原因是由於高等職業技術學校的開辦之時，並無完整的配套措施，在匆促的情況下師資嚴重不足，許多學校採取「先上馬、後備鞍」的做法。在此情形下各校所採取的做法是專兼職教師並存的方式，專職教師是指從其他系統中調入與從高校分配來的名額，調入的來源包含工場企業與科研單位，這類的數量在總教師數中約佔三成(32%)。由於是來自工作崗位，所以他們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工作能力，但在理論知識方面則有待提昇。另外，亦有從普通高校調入的教師，這方面約佔兩成(18%)。從這種背景便可了解其理論背景紮實，而且教學經驗豐富。然而，他們對職業大學的目標與實踐知識方面欠缺清晰的認識，這些方面顯然有異於他們先前所認知到的普通高校。從高校分配得來的師資背景指的是本科生與研究生，這類背景的人數在師資總人數中約佔一半，由於剛自學校畢業，經過嚴格的訓練，所以他們的特性是具有堅實的理論知識，特別是在外語、計算機方面。再者，這類教師剛自學校畢業，所以年齡層較低，也較有活力。但是，缺乏實務的歷練與教學的經驗。

除了其來源結構上的不同，這些專任教師的學歷背景亦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而且普遍學歷程度有待提昇，絕大部分師資的學歷僅及大學的程度或是以下。如本科學歷高達近八成的數量(77.8%)，大專及以下學歷的人數亦有近兩成的水平(18.5%)。相反的，擁有碩士研究生以上的高級學位仍是相當少數(3.7%)。假若將碩士以上學歷視為

高等教育師資的合格條件，顯然絕大部分高等技職學校的師資學歷問題重重，超過九成六(96.3%)的教師學歷僅及大學或是以下的水準。

事實上，擁有高級學位的師資人數稀少的問題並不只存於高等技職學校，而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共同現象。表十三中的資料列舉出 1992 年中國大陸高等學校，各級職稱教師人數及其學歷背景資料，從表中的資料可發掘出擁有高級學位者仍屬鳳毛麟角，具備博士學位者在總人數中尚未及兩個百分點(1.74%)。儘管相較於博士學位，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數量較多，達將近兩成的水準(19.19%)。但是合計碩士與博士的總和僅約為七萬六千人(N=76,612)，在總高等學校教師人數中僅約佔兩成的水平(20.93%)，由此可見擁有高學位的教師仍是不多。在另一方面，專科學歷程度的教師人數卻是為數眾多，將近有三萬人之多，在教師總人數中所佔的比重不低，將近一成(7.82%)，對比於博士學位的教師人數，超過將近四倍半的程度(449.43%)。若合計專科程度與無學位的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更為可觀，高達約十二萬三千餘人(N=123,236)，在教師總人數中微幅超過三分之一(33.66%)，這個數目是具備碩士與博士學位的教師人數總和(N=76,612)的一點六倍(160.87%)。

表十三 1992 年高等學校各級職稱教師與學歷資料統計

學歷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合計
博士	1,239	2,587	2,334	207	6,367
碩士	2,000	9,509	44,855	13,881	70,245
無學位的研究所	2,277	2,568	3,881	1,421	10,147
學士	4,867	22,525	67,230	60,588	155,210
肄業研究生	206	398	224	56	884
無學位的大學畢業生	12,892	51,566	26,817	3,333	94,608
專科	904	6,207	17,202	4,315	28,628
總計	24,385	95,360	162,543	83,801	366,085

資料來源改自陳舜田(民 84：頁 2-12)

歷經四年之後，擁有高級學位教師人數稀少的情形似乎仍未有具體的改善。朱善利(1995)的研究發現正突顯出高級學位教師人數嚴重不足的情形：

「目前管理專業的在校博士生只有 284 人，即使在校的所有博士生在未來三年內能全部取得博士學位，並且全部從事管理教育，平均每各管理類專業也分不到一位博士。」（見劉水深，民 85：39-40）

在對中國大陸管理類科院校師資的研究中，劉水深(民 85)亦發現到普遍存有適任師資甚缺的問題，與此問題最直接關聯的是其學歷背景：

「一般說來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者不多，例如湖南大學管理學院沒有博士，武漢大學也沒有博士，華南理工有 4 位，哈工大 4 位，大連理工 4 位，華中理工有 2 位....各校管理學院在國外進修的人數偏多，如南開、天津、西安交大、大連理工都有將近 20% 的師資正在國外進修。可惜到目前為止，學成回國服務的師資非常少。」（頁 27）

似乎歸國學人成了提昇師資學歷背景一個最直接的管道，然而前述引文中便明白指出，學成之後願意返國服務的人數實在太少了。從表十四中的資料便可發覺出此種現象，從 1978 年 1990 年這十三年間的統計資料中，在 1987 年以前派出國留學的人數大體上呈現成長的趨勢，之後才逐步縮減，其中原因可能是民間出國的風氣已相當興盛。儘管派出國留學的人數不少，並在 1985 年達到高峰期，有將近五千人被派出國留學。但是每年返國的人數與派出國的人數相比成績

並不理想，除了在 1982 年有九成的水準(93.00%)，1983 年(87.47%)、1984 年(74.52%)與 1988 年(79.24%)亦有七成以上的返國服務率之外，其餘各年的返國比率皆未及六成，甚至 1980 年返國的人數尚未及當年派出國留學人數的一成(7.63%)。再者，以中國大陸幅員遼闊高等學校數量眾多的情形，如在 1987 年時便設有 1063 所的高等院校，在此情況之下返國服務的人數實是杯水車薪，假若合計自 1978 年至 1987 年這十間返國服務的總人數為 13,389 人。這約一萬三千人的高級人才表面是為數眾多，但是如以 1987 年時的 1063 所高等院校來平分，每年各校僅分得 1.3 人。而且這是最樂觀的估算，因為返國服務的人數並非全部在高等學校任教，有些是政府機關所派出去的，再者民間企業所提供的高薪誘因，更易使這些歸國學人放棄教職。

表十四 中國大陸 1978 年至 1990 年派出國和畢業回國學生人數

年份	出國	返國	返國與出國百分比	年份	出國	返國	返國與出國百分比
1978	860	248	28.84%	1985	4,888	1,424	29.13%
1979	1,777	231	13.00%	1986	4,676	1,388	19.68%
1980	2,124	162	7.63%	1987	4,703	1,605	34.13%
1981	2,922	1,143	39.12%	1988	3,786	3,000	79.24%
1982	2,326	2,116	93.00%	1989	3,329	1,756	52.75%
1983	2,633	2,303	87.47%	1990	2,950	1,593	54.00%
1984	3,073	2,290	74.52%				

資料來源：陳舜田(民 84：頁 4-5)

這種返國服務意願不高的情形極可能與教師薪資結構不合理有關，新聘博士學位的副教授，其月薪才只有六百元人民幣，這種低落的薪資水準根本很難刺激擁有高級學位者前往高等院校任教的動機。薪資結構不合理影響所及不只是返國意願不高，更造成院校師資嚴重的流失，學校教師薪資低落致使許多教師放棄教職，轉而投效一般企業。這股風潮特別受到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影響，經濟起飛後自

然需求更多的人才，在供需失調的情況下，企業界所提供的薪資待遇自然超過學校的條件許多，所以便吸引許多教師放棄教職，轉而投效私人企業。這種情形就如劉水深(民 85)所言：

「在管理人才供不應求情況下，直接影響在校教師的穩定，使得大量熱門專業教師如財務會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市場營銷等專業教師嚴重流失，如清華大學就已達到 50%。有的學校人才流失的比率甚至高達 80%以上。人才流失造成師資隊伍短少，嚴重影響教學品質的提昇。」（頁 40）

陳舜田(民 84)在其對與中國大陸管理類科的大學教授座談中，所得結論亦有相同的評語：

「他們表示以後大陸大學有一個隱憂，那就是成績表現好的學生，多不願留在大學服務，學士、碩士、博士都一樣。因為許多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大量向大學招募人才，給予很高的待遇，相對之下，大學待遇無法與企業競爭，因之留不住人才。以後大學師資將發生問題。」（頁 4-6）

或許高級學歷只能說明其擁有者具備嚴格的學術訓練，因而具備某方面教學與研究的能力。但是，卻無法保證其真正的研究行動與成果。假若從這個方面來思考，便有需要進一步分析高等技職學校各級職稱的師資結構。因為如果排除學歷背景的因素，在判斷師資素質的方面上，職稱能提供某種程度的資訊，職級升等並非完全決定於學歷，具體的學術研究成果亦是關鍵因素。表十五中的資料為 1990 年至 1994 年五年間，職業大學各級教師職稱的統計資料，從表中可發現教授一級的教師似乎在職業大學成了稀有動物，在 1993 年以前教

授的總人數尚未突破百人，即使之後超過百人，但人數亦不多。若再進一步將各年度教授人數與總教師數相比較，更突顯其稀有性，儘管教授的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是在總教師人數所佔的比率真有嚴重的低落性。在 1993 年以前仍未達一個百分比(1990, 0.60%； 1991, 0.62%； 1992, 0.90%)， 1993 年與 1994 年的比重分別為 1.06%、1.35%，也是相當的低落，未及兩各百分點。相對的，講師與助教職級的教師卻是為數眾多，單就 1990 年而言，講師與助教在總教師人數所佔的比重分別為 33.32% 與 46.34%，合計這兩級所佔的比率更高達近八成的程度(79.67%)，是教授人數的一百三十餘倍(13160.66%)。再就 1994 年而言，講師比率高達超過四成(44.12%)，助教也有近三成的水準(28.38%)，這兩級的教師人數比教授人數超出五十倍以上(5356.55%)。從這些數據的分析可明顯歸納出，中國大陸高等技職學校的師資中，絕大多數是低職級的講師與助教，其顯示的意義是絕大多數的教師並未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或沒有具體的成效。此種現象也再度證明海峽彼岸的高等技職教育師資素質令人堪慮。

表十五 1990 至 1994 年中國大陸職業大學各級專任教師人數統計

年份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教員	總計
1990	61	1,425	3,358	4,670	563	10,077
1991	61	1,351	3,162	4,166	1,083	9,823
1992	88	1,408	3,259	3,677	1,014	9,446
1993	102	1,602	3,976	2,911	1,023	9,614
1994	145	1,995	4,726	3,041	807	10,714

資料來源：黃政傑（民 85：23）

從以上以往的研究資料可歸納出一個結論，中國大陸高等院校的師資存有學歷普遍低落的情形，當然職業大學也無法避免，甚至可能更為嚴重。因為這類學校發展的歷史較短，而且並非重點大學，在此情況下擁有高級學位的教師，在職業大學中算是鳳毛麟角的一群。

假若絕大部分的師資僅擁有大學的學位或是更低，難免由於缺乏系統與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對其教學工作有所影響，最可能的情形是教學變成技藝性的傳授，而不重視理論與學理的學習。簡言之，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師資的學歷結構，極可能造成在教學上過度的實務導向。再者，缺乏高級學位的教師，對於精深的學術研究工作的進行，將有相當不利的影響，這種情況將無法使職業大學提昇其學術水準，來與一般大學相媲美，最後而只流於技藝性的傳授，或是為市場來訓練其勞動力的機構而已，而空有「高等」學校的頭銜。

第四節 經費狀況

與上述師資問題有相當程度關聯的是其薪資的合理與否，高等技職學校師資素質低落的主要原因直接指向其待遇的偏低，而薪資條件往往反映出學校經費的情況，由此可見經費影響所及的層面並未侷限於教師素質的問題，下述內容將從此一角度探究高等技職學校的總體經費概況，接連的段落則分析高等技職學校經費不足對其他方面如設備與圖書的影響。

許多台灣研究者明白地指出，大陸高等院校存有嚴重經費短缺的問題。陳舜田（民 84）便指出教育在大陸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於學校經費短缺。在「一工交、二財貿、剩下的交給文教」的觀念下，教育經費的預算遠較其他部門為低。再加上政府只提供各校經常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其餘不足部分則由各校自籌。在此種情況之下，「創收」活動乃因應而生以充實學校的經費，所以處處可見許多高等院校從事與經濟生產有關的活動。而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面對這種教育經費窘迫的局面，又要提昇其大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所採取的做法是將有限的教育資源投注於少數的學校，於是有所謂「重點

「學校」政策的出現，這類學校的數量並逐年增加。例如 1954 年 12 月時全國僅有六所重點高等學校，1959 年 3 月擴增到 16 所，隔年 10 月激增至 64 所，1981 年底的數量為 86 所，1995 年時又進一步提升為 95 所。

此種政策所導引出的問題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均，就如劉水深（民 85）所指出的：

「列名「211 工程」的名校自然可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上得到很大的優勢，例如清華大學在 1995 年的科研經費是一億一千萬人民幣，而訪問中的其他未列名「211 工程」的學校，有的科研經費尚不到三千萬人民幣之例，其差別待遇之大由此可見。」（頁 37）

在此種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重點學校以外的院校面臨了嚴重經費短缺的問題，而經費不足便直接衝擊到其學校設施。例如陳梅生（民 83）在其研究大陸地區中醫藥教育概況時，便發現到此類問題：

「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因面臨教育經費不足，以致於導致辦學條件不佳的情況：基本建設投資和教育經費嚴重短缺，中醫院校普遍校舍面積小，教學設備陳舊不全，教學基地缺乏。」
(頁 9)

顯然，一般高等院校尚有此問題，何況是高等技職學校。特別是此類學校的財源並非仰仗政府，而是強調多管道、多樣性的政策（黃政傑等，民 85）。其來源的管道包含政府的撥款、社會集資、學費收入與學校創收等方面。然而，這種多樣性卻存有相當大差異性與不

穩定性，甚至經費不足的問題。例如以受訪學校福建中華大學為例(附錄十九)，學校經費來源管道包括，學生繳費、政府補助、中華職業教育社補助、機械廳補助。這些補助的金額並不穩定，學生繳費似乎成為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每位學生所繳三千元人民幣費用，幾近於政府補助每人八百元人民幣的四倍(375.00%)。另外該校藉由機械場與印刷廠等來營造創收，但由於皆為小型規模，所以效益不大。由各項目所得的總金額似乎無法充裕支持學校的發展，例如人事費便佔掉一半的金額。

上述這種經費多樣化的特性，但卻包含不穩定甚至不足的問題，亦可以學校間做比較說明（見表十六、十七）。表十六中的資料為十所職業大學的學校總經費及其各項管道的金額，就總經費一項而言，於這十所學校間的差異性存明顯可見。如江漢大學的總經費高達近七百五十三萬人民幣，這個數目將近四倍(393.33%)於西安大學的一百三十五萬。就如前所述學校經費來源具有多樣性的特色，然而這並不意謂各學校在各種管道所取得的經費數量，或是比重是相同或是接近。相反的，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學費收入對一些學校而言成了主要的財源，如在西安大學便佔有近三分之一的水平(30.9%)。在另一方面，在此表中有六所學校尚未及一成的比重，包含太原大學(2.0%)、鷺江職業大學(5.2%)、金陵職業大學(7.2%)、天津職業大學(7.5%)、昆明大學(8.3%)及唐山大學(9.9%)。對比學費收入在學校總經費最高（西安大學）與最低（太原大學）的比重，兩者差距達十五倍之多(1545.00%)。創收金額在學校總經費所扮演的角色亦有類似的情況，從不及三個百分點（太原大學： 2.7%）的低水準，到超過一成（金陵職業大學： 13.6%）的高比重皆有，這兩者間的差距超過五倍(503.70%)。這種差距性在其他收入一欄更為明顯，在金陵職業大

學佔有將近兩成的份量(18.5%)。相對的，有六所學校尚未及一個百分點的水平，包含佳木斯大學(0.1%)、廣州大學(0.2%)、江漢大學(0.2%)、太原大學(0.4%)、天津職業大學(0.5%)、唐山大學(0.7%)。最高比重的金陵職業大學(18.5%)與最低的佳木斯大學(0.1%)，兩者相差高達一百八十五倍的程度。

表十六 1989年十所職業大學經費來源金額及其在總經費所佔比率
單位：萬元

學校	學校總經費	學費	創收	市政府	其他
江漢大學	752.74	25.02/14.2%	87.8/11.7%	556.47/73.9 %	11.39/0.2%
廣州大學	532.06	66.92/12.6%	17.66/3.3%	446.30/83.9 %	1.18/0.2%
太原大學	403.12	16.00/2.0%	10.68/2.7%	382.50/94.9 %	11.64/0.4%
鷺江職業大學	396.18	20.44/5.2%	23.69/5.9%	352.05/88.9 %	三三
金陵職業大學	348.18	41.84/7.2%	47.58/13.6%	221.24/60.7 %	64.3/18.5%
昆明大學	323.95	7.08/8.3%	三三	297.46/91.8 %	三三
唐山大學	280.05	26.83/9.9%	30.00/10.7%	220.30/78.7 %	2.0/0.7%
佳木斯大學	248.73	26.86/10.8%	三三	221.80/89.1 %	0.1/0.1%
天津職業大學	214	27.75/7.5%	23.60/11.0%	173.40/81.0 %	1.0/0.5%
西安大學	135.27	8.30/30.9%	6.10/4.5%	78.53/58.1%	8.8/6.5%

資料來源：朱慶生等（1991：105）

上述各項分歧的數據便反應出，官方的教育經費在各校的總經費中佔有相當不同的比重，也意謂有些學校的經費幾乎完全仰仗市政府的撥款，如太原大學有幾近九成五的水準(94.9%)。而其他的學校似乎要自求多福了，如西安大學僅及近六成的程度(58.1%)。這種當地市政府對職業大學提供經費比重的極大差異性，也反映出市政府財政條件、對職業大學重視程度不均的情形。另有研究者指出各職業大

學所獲得的官方款項金額差異極大原因在於，各地市政府對各校補助款項的計算方式並不一致（黃政傑等，民 85），依在校學生數或是定額撥款的方式皆有。其他因素如各地經濟發展、財政收入與社會需求等方面的歧異性，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從這些數據中還可歸納出另一種特性，即擁有官方經費來源充足的學校，較不會利用其他的管道來開拓財源，這類型的學校如太原大學。相對的學校則表現出積極的做法，如金陵職業大學無論在創收與其他項目皆有超過一成的比重。事實上，仰仗政府部門的經費仍存在一些問題，職業大學一般皆由中心城市興辦，所以其經費來源大多來自當地的市政府，但是並非每一個城市皆享有豐富的稅收。再者，有些城市並不注重職業大學的發展。另外，有些項目如義務教育便佔掉市政財政計劃中教育預算的絕大部分金額，這些種種的現象就有如朱慶生等（1991）所評論的，政府撥款存有侷促性的問題：

「一是中心城市教育事業發展的速度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儘管市政府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而逐年增加教育經費，仍不能滿足各級各類教育，職業大學也不例外；二是市政府支持各級各類教育，其教育經費分散使用，職業大學所得有限；三是市政府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盡力支持中小學的鞏固和發展，其教育經費的使用有所側重，因而把職業大學放在次要地位。」（頁 106）

市撥經費的多寡並不能代表真正的意義，因為各校學生數多寡不一，所以需進一步分析每生每年所分配到的金額，才有意義。從表十七中基建費與常年教育經費餘額兩項來看，各校在基礎建設所需的金額差異相當大，有的學校在基建項目的開支便耗費掉絕大部分的市撥經費金額，如昆明大學(70.93%)與太原大學(69.54%)皆有七成左右

的比重。相反的，有的學校僅達不及三成的水準，如金陵職業大學(28.40%)，甚至僅有一成的程度，如天津職業大學(10.38%)。基建金額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常年教育經費的餘額，當然這類餘額的多寡並無多大意義，因為各校規模不一，若將其餘額除以在校學生數，便可得知每生每年的培養費。在此一欄中便可發覺到各校的情形差距極大，排名最高的天津職業大學在校生每人每年可分配到1,644元的經費。相反的，西安大學學生所享有的金額最少，僅有448元，高低間的差距超過三倍半以上的水準(366.96%)。事實上，表十七中的七所學校在中國大陸的職業大學中是較具規模的，因為這些學校所處的位置皆是大城市或是較大城市，這些市政府的經濟實力與財政收入比所在省的情況為佳，由這種某些學校每位在校生所享有的額度仍然不高的情況，便可推論許多職業大學的情況更為嚴重：

「有的不到普通高校在校生年均培養費的一半，處於經濟狀況較好的大城市或較大城市的職業大學尚且如此，處於經濟狀況較差的中等城市的職業大學就更嚴重了。事實表明，政府撥款的侷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朱慶生等，1991：107）

表十七 1989年七所職業大學各項經費數目及在校生平均使用金額

學校	市撥經費 (萬元)	基建費 (萬元)	常年教育經費 餘額(萬元)	在校生數 (人)	每生年均經費 (元)
天津職業大學	173.40	18	155.40	945	1,644
太原大學	382.50	266	116.50	838	1,390
廣州大學	446.30	205.6	240.70	2,031	1,185
唐山大學	220.30	100	120.30	1,066	1,128
金陵職業大學	211.24	60	151.24	1,590	951
昆明大學	297.46	211	86.46	1,100	786
西安大學	78.53	35.5	43.03	938	448

資料來源：朱慶生等（1991：107）

第五節 設備與圖書

上節的要點證明中國大陸高等技職學校的經費普遍不足，學校經費不足便難以改善學校現有的設備，簡陋的設備與器材將進一步影響到教學的成效。許多的研究者便發現大陸高等技職學校的設備可以「因陋就簡」，甚至「破爛」來形容。例如劉水深（民 85）在其研究報告中便有相關的描述：

「以個人電腦的數量為例，在訪問的學校中(23 所重點學校)，只有半數的學校有個人電腦 50 部以上。其餘各校很多只有幾部舊型的 286 或 386 電腦，至於其他影印機，投影機等設備更是稀有。其他教學設施更是簡陋，與台灣不可同日而語。」
(頁 32)

表十八列舉 1986 年時 98 所職業大學的實驗室設備價值統計資料，從表中的數據可明顯看出，學校的設經費備普遍嚴重不足。僅有 25 所學校實驗室的設備資產超過一百萬元，介於五十至一百萬元的設備資產有 13 所，五十萬元以下的高達 60 所。如果將這一百萬、一百萬至五十萬、五十萬以下，分別界定為高、中、低三個水準指標，則擁有高水平設備的學校數在總樣本數中僅約四分之一(25.51%)。相反的，設備簡陋的學校卻是絕大多數，所佔比率高達六成(61.22%)。

表十八 1986 年職業大學實驗室設備統計資料

規模	數量
100 萬元以上	25
50-100 萬元	13
50 萬元以下	60

資料來源：林寶琨（1991：169）

宋懷德(1991)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結論，指出僅有 61 所職業大學同時擁有教學大樓、圖書館、實驗室的設備，但卻有約半數(50.81%)的職業大學設備不全。這種設備簡陋的情形，無論對教學或是學術研究，皆有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除了設備外，與教學成效緊密關聯的圖書數量，雖然缺乏直接的有關數據，但是某些研究卻可作為推論的依據，這些論點仍指向大陸高等技職學校的圖書設備也是乏善可陳。如劉水深（民 85）便指出高等學校圖書的「簡」與「陋」兩大特徵：

「同樣受限於經費，大陸的圖書設備一般而言相當缺乏或老舊，號稱藏書百萬的大學哈工大、南開、西安交大等學校外文藏書都相當缺乏....至於外文專業圖書雜誌更是缺乏，因為長期訂購外文專業雜誌，費用很大，非各校所能負擔....經費嚴重不足是大陸高等學校共同的問題。」（頁 32）

上述各節的要點顯示出，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面臨嚴重經費不足的窘境，經費不足所引發的一連串問題。其中包含由於薪資待遇不合理，以致於無法吸引優良的教師，甚至有許多教師放棄教職轉而投效私人企業，最後導致高等技職學校師資素質普遍低落的情形。經費不足所形成的另一類問題則是涵蓋到學校的設備、圖書條件不佳，甚至以可以「因陋就簡」，或是「破、舊」來形容。顯而易見的，這些林林種種不利教學的情境，便直接衝擊到高等技職教育的成效。儘管謝貴雄（民 83）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大陸八所重點醫學院校，但是其訪問的結論卻是對經費不足所造成的教學問題有著傳神的描述：

「教育制度尚佳，研究水準則因經費缺少及年輕學者滯留國外，及研究環境特別是設備及缺少積極的鼓勵，其基礎研究與我國尚差十年以上。」（頁 47）